

◎文学新地理◎

# 福建文学：理论创作并驾齐驱

□南帆

- 诗人的队伍太庞大了，水平整齐，实力强劲
- 为什么福建盛产文学批评家？
- 一大批福建的小说作家正在专注地端详社会生活



孙绍振



舒婷



杨少衡



林那北



须一瓜



汤养宗

文学地理的一个涵义即是，将地图上名山大川的标识置换为作家或者诗人的名字。例如，可以将福建的武夷山置换为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许多人背得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柳永的籍贯是武夷山。柳永屡试不第，二十来岁离开家乡不再回返，自称“白衣卿相”，浪迹于京城与江浙一带。尽管如此，他仿佛在这一片土地播撒下了诗歌的种子。那些闽籍诗人字斟句酌地推敲自己的诗作时，不知是否记起了这位1000多年前的先辈？

20世纪以来，福建著名的现代诗人首推冰心。她的《繁星》是公认的五四时期文学经典。迄今，围绕《繁星》的各种评论不计其数。然而，简约地概括《繁星》风格的毋宁说仍然是浓缩了她笔名的那句诗——“一片冰心在玉壶”。余生也晚，无缘领略五四时期冰心的魅力。当20世纪80年代，慈祥的“冰心奶奶”再度作为文学大师现身时，她已不再写诗。冰心发表第一篇作品的时候，福建的另一个著名诗人蔡其矫刚刚出生。蔡其矫生活坎坷，经历曲折，曾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耄耋之年，他仍然保持了诗人的形象：这一位诗人头发卷曲，面容黝黑，目光炯然。我曾经听到他以浓重的闽南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歌：“一切都因你而生动，波浪啊！”作为一个诗歌外围分子，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打动。

最近40年，福建最有影响的诗人显然是舒婷。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舒婷与北岛、江河、芒克、食指、顾城等诗人共同成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一场激烈的诗学辩论之后，“朦胧诗”的美学地位获得了认可。舒婷的《致橡树》等诗人入选中学课本。根据我的观察，许多人与舒婷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我是读着你的诗歌长大的”。她时常被一大批崇拜者突如其来地包围，镁光灯不由分说地亮起来，然后一大堆诗集堆在桌子上，签名、签名、签名。当然，各种世俗的荣誉无法迷惑真正的诗人。面对矗立于长江三峡的神女峰，舒婷的感慨是——“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我不再逐一罗列舒婷之后的福建诗人，这个队伍太庞大了。他们隐藏在大街小巷，优美的诗句时常出其不意地逸出一个个幽暗的窗口。月明风清的夜晚，他们或许会聚集在滨江公园一个简陋的舞台周围，兴致勃勃地朗诵自己或者他人的诗歌。如同“新生代”或者“口语派”一样，福建诗人偶尔也热衷于为自己的美学

风格制造一两个特殊的称谓。相对来说，“闽东诗群”不是多么响亮的名称，根据地域命名而已。然而，这一批诗人水平整齐，实力强劲，“闽东诗群”的一个代表人物汤养宗刚刚荣获新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

人们从“朦胧诗”诱发的诗学辩论中发现，闽籍批评家构成了主力军。福建盛产文学批评家，坊间有“闽派批评”之称。王蒙当年曾经戏言，文学批评界“京派”“海派”“闽派”三足鼎立，这个概括令人鼓舞。所谓的“闽派”并未集合于福建的某个学术机构，亦不曾拥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批评家之间明显的共性毋宁说是“闽籍”。一批闽籍批评家汇聚于首善之区北京，声名远扬，例如谢冕、张炯、童庆炳、陈晓明；若干闽籍批评家分散于各地，佼佼者如上海的潘旭澜、李子云、朱大可，广东的谢有顺。当然，更多的批评家驻守于福建大本营，孙绍振、刘登翰堪称代表人物。众多闽籍批评家的成长背景如此不同，文学观念各执一词，彼此之间

甚至出现各种程度的争论。

回到文学地理的主题，人们宁可关注这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福建盛产文学批评家？“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每一个批评家都拥有激动自己的话题，但是，这一片土地为什么赋予他们相近的文化性格？坦率地说，我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我亦属这个队伍的一员。“闽人好辩”仅仅是哪一位大佬的戏谑之言，历史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写出《诗人玉屑》的魏庆之和写出《沧浪诗话》的严羽均为宋朝人士，二人可视为闽籍批评家的先贤。至于朱熹、李贽、严复，当为闽籍思想家的楷模。尽管如此，这些历史人物阐述的是普遍的义理；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在福建的地域文化内部埋藏了特殊而强大的理论种子。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主题是解放，许多闽籍批评家感受到启动思想的迫切愿望——除了这个不那么充分的解释，我没有想到更多的内容。有趣的是，这个小小的悬念迄今还在持续：我与刘小新共同主编的“闽派批评新说丛书”

证明，更为年轻的一批闽籍批评家已经迅速地跟了上来。

梨园戏、莆仙戏、闽剧、歌仔戏——多少人听过福建的地方戏曲？福建的地方戏曲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曲调婉转优雅，风格亦庄亦谐，喜欢的人时常痴迷其间而不能自拔。除了传统剧目，福建的地方戏曲新作不断，陈仁鉴、王仁杰、郑怀兴等均为一流剧作家。地方戏曲依赖方言叙事。方言使这些戏曲韵味十足；同时，方言也限制了这些戏曲的传播范围。戏曲是农耕社会的文化产物，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戏曲的节奏、表演程式、符号体系多少有些力不从心。福建倚山傍海：沿海一条狭窄的平原，西部的武夷山脉犹如一圈翠绿的屏风。福建各地的风俗民情迥然不同，这种状况不仅可以追溯到沿海地带与山区不同的生活经验，还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方言区域。福建居然存在四种不同的方言体系：福州话、闽南话、客家话、莆仙话；这些方言互不相通，并且分别拥有各自的文化脉络。现今的福建居民多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原移民，中原文化层层叠叠地压缩在地域文化内部；同时，海峡的对岸即是台湾，两岸之间的历史演绎出无数的爱恨情仇。古往今来，这一切无不汇入这一片土地的日常现实，斑斓多变，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我相信一大批福建的小说作家正在专注地端详这种社会生活。进入21世纪，福建的小说有异军突起之势，杨少衡、林那北、须一瓜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与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的成功合作更扩大了影响。尽管如此，众多小说作家仍然在持续地探索。我隐约地觉得，小说作家正在进行某种紧张的文学围猎，他们试图捕捉这一片土地的真正神韵，使之充分地展现。杰作正在无声地酝酿，未来可期。

我愿意邀请散文压阵。这个文体行云流水，不拘一格，“虽好却小，虽小却好”。提及福建的散文，多数人首先想到了郭风与何为两位文学前辈的名字。郭风的创作以散文为主，他还钟情于一个特殊文体“散文诗”。《叶笛集》的标题沁人心脾。何为同样以散文名世，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次考试》与70年代的《临江楼记》均脍炙人口。郭风与何为之后，专事散文写作的作家不多，名声在外者如章武。然而，福建的散文作品为数众多。诗人、小说作家、批评家乃至一些企业家或者官员不时趺过来一试身手，而且佳作频出。事实上，福建的散文作者数量巨大——这正是我邀请散文压阵的原因。

◎作家谈

## 散文的变局

□熊育群



每一种风格的语言都有它潜在的逻辑性，作家创作是经验与语言互动的结果

虚构、非虚构的区别被关注，它在证明真实性原则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不是降低而是上升了。传统的虚构文学体裁——小说，也在尝试与非虚构的融合，何以散文却要放弃这一原则？这是否意味着散文体裁分化的可能与必要？虚构的散文能否构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它的归属并非小说，又如何与小说区分，这可能也是小说体裁的命题。文学以诗歌、散文、小说分类的时代步入了一个界线模糊的时期。

简单来说，我们在谈到散文时不是还把散文当作一种文学的体裁？如果不是，那没有争议的必要性。如果是，那问题就简单得多，文学的审美性，它的形象思维的特点，它的艺术性要求都是顺理成章的。它与小说、诗歌既定的文学体裁必须作一个概念的区分，必须指出它的疆域所在，找出散文的概念、范畴，加以定义。否则散文名存实亡。

上个世纪90年代，“大散文”风行，艺术性散文受到质疑。创作上开始出现无序状态，理论批评失范，一直发展至今。散文几成文字的收容所，文体净化再回到起点。

就我个人的创作而言，也有非常明显的三个阶段。刚写散文时几乎用诗的要求从事散文创作，那就是对诗情画意的语言的刻意追求，钟情于一种灵动的、湿漉漉的文字之美；其次是追求一种诗的意境，相应的题材多是与自然相关的，是个人心灵与情感的表现。这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散文、美文，空灵则空灵矣，却也单薄，有时会显得空泛。

改变是我来广东工作之后，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影响了我。日常生活、人间烟火开始进入散文，内容占据了主导地位。那种诗性的语言已经无法描述、表现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我在探索广阔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同时，如何保持散文的诗性。散文可以靠近生活，但它的境界仍然要有空灵之气。

文学改变始于语言。没有白话文，现代文学改良就是空话。每一种风格的语言都有它潜在的逻辑性，作家创作是经验与语言互动的结果。语言不是被动的，相异的表达可能发现相异的经验。我的第二阶段的散文写作，开启了人文、历史、自然、社会、人生等视角，相应地我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文字更重质感，讲究坚硬有力，讲究及物，相比初期的短文，篇幅也长了数倍。这个阶段对真实性的追求近乎苛求，我采取了田野调查的方式，讲究在场、亲历，看重感受、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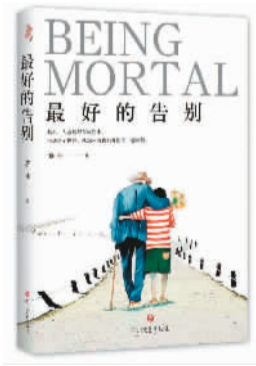
目前进入新的探索阶段，更加看重不以文害意，看重对现实的观察与反思，看重思想的品质，相应地放宽了非文学语言进来的尺度，审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追求以整体的思想的力量造成心灵的冲击。譬如今年分别发表在《十月》与《人民文学》上的散文《回头是岸》《双旗之城》就是这方面的作品。与早期艺术散文相比，已是另一番天地了。

回顾自己散文创作的历程，既有对散文概念的坚守，也有一些突破。以审美性为前提是我坚持的准则，但不等同于每一行每一句都必须如此。形象思维是骨架，但不应该排斥抽象思维，甚至原始材料的引用只要得当也不排斥，这是追求真实性的结果。这里须注意的是作家个人主体性的发挥，它的视角是极其个人化的，带有个人的感知与观察，是与心灵有关的。一篇好的散文要有个人的灵魂在里面。最后强调一下真实性的问题，我坚持认为这是散文的立身之本。

## 探讨死亡与生命的尊严

——读蒋林长篇新作《最好的告别》

□ 郑润良



毫无疑问，《最好的告别》的中心词是“死亡”，是告别人生。对于死亡，大多数的中国人选择视而不见的态度。除非死到临头，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恐怕与孔子所言的“未知生，焉知死”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习惯是提倡乐观文化，是对人生的实用态度，强调通过现世的劳动获取物质幸福、享受人伦之乐。与之相应的，则是死亡的方式、尊严等问题被无限搁置了。但是，被搁置不等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物质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很多媒体已经在探讨“中国人已经超越物质幸福阶段”这类议题。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将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寻求、思考个体生存的精神价值、身心如何安放等深层次的伦理问题。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言，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死亡是每个人生命不可逃避的终点，显然也是我们思考人生意义无法回避的参照。

蒋林的《最好的告别》是对“全球十大思想家”之一的阿图·葛文德医生的致敬之作。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采用的更多是非虚构的方式，是基于对临终者群体的采访创作的。蒋林显然也受此

启发，他的作品也是基于临终关怀医院的多年亲身经历，但采用的是虚构的方式，通过一老一小两个主人公的典型体验，探讨生命与死亡的辩证关系。

《最好的告别》中两个人物的设置显然颇为用心。一个是饱经沧桑的老年，一个是初涉人世的少年，同样要面对沉重的死亡。尽管两人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他们在亲人的理解和帮助下，最大限度地完成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规划，实现了与自己的人生和解、与死亡和解的目标。

老人凌先生，既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写作者。这种设定既使更多的读者能够从角色身上获得代入感，也使人具备超越于普通人、深度思考人生的能力。一开始，凌先生放弃治疗并不能得到亲人的支持，但他凭借坚持和耐心说服了亲人，终于获得了儿子的理解，在“世外桃源”安静地书写自己最后一部作品《与人生言和》。男孩小可则见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葡萄牙足球教练穆里尼奥，并成为了球队的荣誉成员。凌先生和小可甚至还一起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关于两人的追悼会。作者通过两个主人公的体验和思考告诉人们，尽量不要遗憾地离开人世是最重要的，这样的死亡是有尊严的，这样的人生是有尊严的。

同时，作品还涉及到安乐死等现实问题。正如评论家所说，“小说以艺术的方式将人道主义伦理困境与法律之间的二维悖论问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虽然安乐死几乎已经取得世界性的共识，但面对法律、人伦、亲情、生命、尊严等诸多要素，如何探索出一条更有效的方式，既能满足人道主义伦理要求，又与社会法理相符合，将是长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阿图·葛文德的著作曾有力推动美国医改政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作品能够有力介入现实，推动社会进步。

## 直面现实的写作

——读杨晓升中短篇小说集《寻找叶丽雅》

□ 苏富琼



2018年9月，鹭江出版社出版了作家杨晓升的中短篇小说集《寻找叶丽雅》。书名像一个个充满想象的童话，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

杨晓升善于处理记忆与印象。中篇小说《寻找叶丽雅》以“我”初恋情人身份去寻找叶丽雅死亡的真相。故事采取倒序的叙事方式，以北京大报记者的身份、官大一级的死者的寻常办法试图展开调查，却受到重重阻碍，甚至是生命威胁。虽然叶丽雅的死因最终也未查出真相，但随着查找中不断出现的状况，聪明的读者也已经找到了答案。

故事中的很多主人公都没有姓名，作者只简单的称呼为男的、女的。例如《男人·女人》里要扔掉亲生儿子的男人、《赌村》里老虎的俊女人、《冬日》里的半边脸的男女人和女人、《宝贝女儿》里的宝贝女儿等。作者似乎在提醒读者，这些没有姓名的主人公是来自你们生活中的你、你们、她（他）、她（他）们。也许，无名即共名，或许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里，类似的故事正在发生。杨晓升把湮没到生活中的日常故事打捞起来，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似一根根银针，扎痛人们早已麻木的神经。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揭露，不仅仅是撕

开丑恶给人看，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尊重人性，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善的启发。《赌村》中，为赌一博老虎的俊女人一笑闹出人命的案的一把挫意外死亡。多年后，人们发现，每到清明节，一把挫的坟头上就会有一束色彩斑斓的山花，有传言说是老虎的俊女人送的。花的形象给小说阴郁的色调带来了一丝光明与温暖。

还有文集中许多女性人物的名字，《溅血的城市》里的水莲、《丢人》里的妮、《生生不息》里的菊莲、《寻找叶丽雅》里的叶丽雅，作者赋予了她们花的名字，纯净而美好。她们的喜怒哀乐像散落的花瓣一样无人问津，是杨晓升恰到好处地避开不堪的描述，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具有悲悯情怀的心，精雕细琢人性、心理的复杂多样，不疾不徐再现了她们们的故事，细腻地刻画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唤起了读者对她们深深的同情之心。这也是我一直喜欢读杨晓升作品的原因。不猎奇、不偷巧，尊重人性、直面现实、敢于唤醒，又不缺乏浪漫的古典美，有种曾经忽略了，突然又被撞了个满怀的感觉。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写实，还在于唤醒。书中收录的小说，写于不同时期，时间跨度30余年。特别是《寻找叶丽雅》《赌村》《生生不息》《枯树》《宝贝女儿》等作品，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感。阅读作品，就是在阅读社会的一个缩影和历史发展的轨迹，读者从中深深感受到了作者的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要想唤醒，首先必须是触动，只有被深深震撼到了，才会引发共鸣。

《寻找叶丽雅》《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及早些年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等直面现实的作品，反映出杨晓升对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场一直保持着高度敏锐的思考和创作能力。